

DAXUE YU CHENGSHIDICENG SHEHUI DE HUDONG
MINGUOSHIQI MINZHONG JIAOYU SHIYANQU YANJIU

大学与城市底层社会的互动

|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实验区研究 |

娄奋非◎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DAXUE YU CHENGSHIDICENG SHEHUI DE HUDONG
MINGUOSHIQI MINZHONG JIAOYU SHIYANQU YANJIU

大学与城市底层社会的互动

|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实验区研究 |

娄岱菲◎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与城市底层社会的互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实验区研究 / 娄忞菲著.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8
ISBN 978-7-210-11121-4

I. ①大… II. ①娄… III. ①大学生—农村—社会实践—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G64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2688号

大学与城市底层社会的互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实验区研究
娄忞菲 著

责任编辑：饶 芬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0791-88629871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jxpph.com

E-mail：gjzx999@126.com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5

字 数：200千字

ISBN 978-7-210-11121-4

赣版权登字—01—2018—106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58.00元

承 印 厂：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001
一、已有研究回顾	002
二、大学史的书写	020
三、研究立场	028
四、研究思路	033
第一章 20 世纪 30 年代的乡村与新教育	038
一、大萧条下的乡村与都市	039
二、破产声中的“教育崩溃”	053
三、离不开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070
四、本章小结	081
第二章 北平师范大学与温泉乡村实验区	083
一、李蒸与乡村教育实验	084
二、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基本概况与组织	092

三、乡村师范班：“实验事业之基本动力”	100
四、实践乡村民众教育	114
五、本章小结	125
第三章 “到农村去”：中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	129
一、邹鲁与中山大学乡村服务	131
二、实验区的基本状况与制度设计	135
三、实验区的困境与解决之道	145
四、抗日主题下的乡村动员	161
五、本章小结	169
第四章 大夏大学与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	172
一、初步尝试：大夏公社（1932—1933）	173
二、分项实验：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1933—1935）	183
三、邵爽秋的民生教育理想与实践	200
四、本章小结	211
第五章 结论：大学与乡村建设	215
参考文献	223

绪论

2005年9月，为庆祝建校一百周年，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以“大学与城市互动”为主题的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来自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参与了此次盛会。在大会的主题发言中，各位校长对各自学校与所在城市之间的历史做了简短回顾，也对未来大学在城市发展中的责任做了大胆的预测。正如时任牛津大学校长的约翰·胡德（John Hood）在发言中所称：“衡量城市中的大学不但要看其担负的科研功能，而且要看信息技术导致的瞬息万变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大学为社区定位、分析和解决各种突出问题所发挥的能力。”^①与会者对未来的城市的发展充满信心，也对城市中的大学寄予极大的期望。

大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古老却历久弥新的话题。回溯古今中外大学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从中世纪大学的源头来看，还是只关注近代中国大学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大学都运用其独特的生存法则谋求在城市中可以生根发芽，城市最初对大学并不一定充满热情、表示友好，也曾出现过相当激烈的排斥和对抗。因此，在讨论大学与城市互动之时，就需要结合着大学与城市各自的传统与现实来做出分析。

本书主要选取20世纪30年代起以不同性质大学为主体创建的教育实验区作为考察对象。区别于由教育机构或个人组织的近代乡村教育实验，这些实验区以大学周边城乡结合区域作为改造的主要目标，通过推

^① 约翰·胡德（John Hood）：《大学对城市的影响》，邵常盈译，乐毅校，《复旦教育论坛》2005年第6期，第15页。

广普及教育、传授现代生产生活知识等手段，利用教育资源优势服务于城市及周边的区域社会，践行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近代中国大学自创建之日起就担负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这种传统的确立与传承，既与中国大学建立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大学学人所具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有关。同时这一过程还与大学所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互为影响，其互动关系是理解当下诸多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所谓“城市底层社会”，是指处于城市边缘的底层民众或外来人员所组成的社群。他们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一般都处于底层，虽然受到都市文化的熏陶，但有限的文化水平并未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与所在区域都经历着由乡村到都市的文化蜕变。近代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发展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中，自20世纪30年代爆发农村破产危机之后，身处城市的大学逐渐成为促进城乡互动的参与者之一。作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播者，由大学所创设的教育实验区，部分改善和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居住条件、生产技术水平及教育文化程度，也为动员民众积极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深入剖析民国时期教育实验区创设的原因、过程，总结其特点及不足，探讨其与城乡结合地区底层社会丰富紧密的联系，对思考当前大学如何在与社会的互动之中更好地实现社会服务功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已有研究回顾

（一）乡村建设实验及实验区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发现当时的新式教育并不如最初期待的那样可以解决人才的危局，反而带来了教育普及程度不高、推广不力、水平仍然较为低下等诸多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为了解决这些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在部分有识之士的号召之下，中国各地开始掀起了以普通民众为目标人群，以提升其生活技能，改善其生存环境，

造就现代公民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在探讨这场社会运动时，运动发起者们使用民众教育、社会教育、乡村教育等很多相近的概念进行命名。这些概念之间，有的以施教对象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划分标准，有的使用城乡的地域差别进行区分，但从其实质而言，各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有颇多交叉相近之处。这些概念的使用者虽然力图在各自的论证中做出界定，以便明确讨论范围，但书面上的学理探讨，并不能等同于现实的逻辑。从实际层面上看，这些概念往往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特别是对那些接受改造的普通民众来说，似乎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差别。运动发起者在创造并使用这些概念时，既可以看到与社会整体思潮呼应之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受其自身内涵外延生成衍化的影响。因此，需要进入到时人讨论的话语体系之内，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才能完成“下定义”的工作。结合本书的研究对象考虑，大学所办实验区主要针对学校周边城乡结合地区民众展开实验，多以“乡村实验区”命名，其施教对象也多以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及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入工厂做工的城市贫民为主。因此，本段主要选择乡村教育作为文献回顾的主要范围。

在西潮冲击之下，中国社会在旧有传统与新建规则不断调试过程中进入了20世纪。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凸显的乡村教育问题，其源头却可以追溯到清末早期现代化阶段。有学者以“教育冲突”来概括“新式教育导入乡村社会后，乡村中各种力量围绕新式教育发生的各种争执、斗争等活动”，继而以“消极行动”（抵制和散布负面舆论）、“教育诉讼”“暴力行动”来概括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的表征。^①乡村固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更易使其维持内部的自我循环，这种模式越是牢固，就越是难以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在尚未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系统之前，私塾一般会承担起乡村教育之责。而随着科举制的停废，被视为

^① 田正平，陈胜：《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75-76页。

更先进教育方式的新式学校与传统私塾之间冲突也不断激化。有学者从群体人物的角度，以“一个阶层的消失”为主线考察了塾师自晚晴以降从主流到边缘再至消亡的演化过程。^①也有学者在考察近代“教育”概念形成变化的基础上，呈现出清末至民国间私塾与学堂之间争论的复杂面向，指出这并非是可以简单用“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来简单做出判定的，其间实际上有着“长期的纠缠竞争”。^②

与代表着近代化的沿海大城市日趋繁荣不同，乡村社会更像是已近暮年的老人，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失去了活力，乡村破产、乡村凋敝之声不绝于耳。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围绕着乡村社会特质以及如何进行乡村建设，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涌现出一大批研究论著。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1929年）、孔雪雄的《中国今日之农村涉及》（1933年）、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1934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年）及《乡土中国》（1947年）、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5年）等。这些著作问世于不同年代，作者求学经历和写作机缘各异，所用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都不尽相同，但其背后想要求索的根本性问题却是一致的，即对如何扭转乡村日益衰败的现实问题和定义运动本身的性质做出回应。自此之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始终在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之中，也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无法绕开的主题。

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三农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历史角度梳理近代以来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演变逐渐成为热点。教育史研究更关注的是这场运动涉及的“教育”问题，因此通过“教育”将“乡村教育运动”与“乡村建设运动”贯穿起来思考，或许可以绕开孤立的概念辨析而回到更具体的教育实践层面去完成概念的界定。

① 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晴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② 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三联书店2017年，第166-168页。

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较早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全景式考察的专著。他指出,乡村教育向乡村建设转变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乡村建设的内容包括乡村教育,乡村教育只是乡村建设的一个方面或部分”。作者在分析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背景的基础上,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运动,其章节目录均以“实验”作为概括,也揭示出这场运动的探索性质。^①同一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同样关注了实验问题。其特色在于,主要从教育史角度对近代教育实验做出了全面的梳理,时间跨度自清末截止至1949年,研究对象也更为丰富。作者将近代教育实验划分为“教育行政实验”“学科教育实验”以及“教育综合实验”三种类型,定县、邹平等处实验因牵涉面较广,被归入“教育综合实验”。另外还对上海农村念二社所办的民生教育实验、江苏省立教育院所办的民众教育实验以及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实验等都做了梳理,是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参考。^②

针对具体的实验区域,也有不少学者尝试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较为全面地整理各实验区成立时间、地址、指导机关、实验区范围、实施内容及成效等;^③或是对“邹平模式”“定县模式”“青岛模式”之间异同关系进行辨析;^④另有学者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自治与20世纪80年代的村民自治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各自的现实基础和运行机制,希望“从历史的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农村治理的模式做出概括,并为现

①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0-77页。

② 熊明安,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③ 赵兴胜等:《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6-342页。

④ 崔玉婷:《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不同路向:邹平教育模式与延安教育模式比较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魏本权:《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民国山东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实的农村民主治理提供思路。^①还有学者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展开，其中尤以丹麦学者曹诗弟（Stig Thoegersen）对山东邹平乡村学校的研究视野最为宽阔。作者将时间下限延至 21 世纪前夜，考察了近百年来邹平教育的变迁。^②

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是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主动选择转向乡村，回到民间。但其背后有着不同的出发点，选取不同区域进行实验，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有学者从思想史角度对中国近代乡村教育思潮的发展轨迹等进行梳理，从思潮变迁的角度比较了各流派教育家的乡村改造运动在指导思想及实践方式上的异同。^③还有学者将乡村建设思潮流派放置到近代教育思潮的大背景之下进行了讨论，具体分析了“生活教育派”“平民教育派”“职业教育派”“乡村建设派”等不同流派的主张和实践。其中，中山大学的曹天忠提供的另外一条思考路径颇可参考。他观察到，乡村建设不同流派的实际数量远超当下的判断，因此需要追问的是“这些派别概念在当时怎样出现的、形成的途径是什么”。他区分了乡村建设各派的核心观点，并指出各派观点虽有差异，但都是根据所处的区域实际出发，“从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某一方面入手”，其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全国的复兴探索一套整体的办法”，因此可以说殊途而归同。^④上海社科院的蒋宝麟观察到，既往研究对乡村建设运动评价时都会有一个“潜在的倾向”，即先有价值预设，或援引某一方面的言说以“当下眼光”评判这场运动缺漏与失败的根源。这种立场实际上“既

① 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第 3 页。

② [丹麦]曹诗弟（Stig Thoegersen）：《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泥安儒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③ 苗春德：《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④ 曹天忠：《乡村建设派分概念形成史考溯》，《广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3 期，第 134-139 页；曹天忠：《1930 年代乡村建设派别之间的自发互动》，《学术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96-102 页。

成为论争中的一方，又兼‘裁判’之职”，是应该警惕的。他提出应该关注“乡村建设运动评价史”，即乡村建设运动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其性质或该场运动领袖的形象是“不断重构”的过程。^①

除了对乡村建设思潮整体性的讨论之外，对核心人物的研究也是以往研究关注较多的重要方面。具体讨论主要集中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代表作如吴相湘的《晏阳初传》（岳麓书社 2001 年），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年），孙诗锦的《启蒙与重建：晏阳初乡村文化建设事业研究（1926—1937）》（商务印书馆 2012 年），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马勇的《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年），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郑大华的《梁漱溟传》（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熊贤君的《俞庆棠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等。此外，近年来以往关注较少的乡建运动重要的参与者，如雷沛鸿、卢作孚等人的研究也有所突破。^②与人物研究相对应，对核心关键人物所在机构，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华洋义赈会等，陆续有通论式考察。^③

从上述梳理来看，以往研究主题大致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从思想层面对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的宏观分析；二是围绕该运动的领导者，特别

① 蒋宝麟：《体国经世：民国的学人与商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年，第 22，26 页。

② 相关研究可以参考雷坚：《雷沛鸿传》，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曹天忠：《教育与社会改造：雷沛鸿与近代广西教育及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谢文庆：《本土化视域中的近代西部地区办学取向研究：“融入式”和“互摄式”办学之比较》，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③ 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吴仲信主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薛毅，章鼎：《章元善与华洋义赈会》，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年；薛毅：《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华洋义赈会》，《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

是对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核心人物及其所在机构的研究。总体来看，目前对乡村建设运动兴起原因、过程等总体面貌和轮廓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整理，也在评价其功绩与不足方面基本达成一致。不过，作为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乡村建设运动，其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歧性以及持续不断的影响力，在基本史实层面和解释层面仍有很大的空间。

再来看大学所办实验区的相关研究。大学一直都是乡村建设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参与者。各校大致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展开实验，希望利用自己的优势服务于社会。1933 年 7 月，“国内从事实地乡建事业者”更是齐聚邹平举行了首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与会者除了平教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华洋义赈会、实业部等机构之外，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亦派代表参加。与会的学校只是当时参与办理实验区的部分代表，尚有北平师范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先后投身于实验区的创建。对这一段历史的挖掘，与 2000 年后学界对近代中国大学历史研究的逐渐升温有关。目前，学界对大学创建之教育实验区的研究，以教会大学所办实验区受到关注较多，或以某一

学校的个案分析,或以具有某一特征的同类院校为讨论对象,^①而对国立、私立等其他性质大学所办教育实验区的讨论尚不充分。这一方面是因教会大学史研究开展较早,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也与教会大学的资料相对于其他性质的大学记录更为翔实且保存较为系统有关。

回溯不同教派教会大学在中国办学的历史,其开办之初都带有传教的目的。但受到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兴起以及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调整传教与办学策略是各校共同面临的问题。杨念群在论及社会福音派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时指出,传教士开始真正关注乡村的问题,是与传教策略的调整有关。基督教乡建运动转向更卓有成效的世俗化路径,“以乡民最迫切的需要为指向和参照建构服务体系”。

^① 参见夏军:《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乡村建设运动》,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张剑:《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国农业近代化》,《史林》1998年第3期;沈志忠:《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初探——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中心》,《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李在全:《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以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心的考察》,《教育学报》2005年第6期,第87-94页;李在全:《神圣思维下的世俗建设:福建协和大学的乡村建设运动——兼及如何评价乡村建设运动》,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04-418页。在众多研究中,尤以对燕京大学清河试验区的研究相对最为丰富。有关清河试验区的情况可参见彭秀良的系列文章,《清河实验(一):概述》(《中国社会工作》2015年第8期),《清河实验(二):工作原则、组织架构及经费》(《中国社会工作》2015年第9期),《清河实验(三):发展经济》(《中国社会工作》2015年第10期),《清河实验(四):社会服务工作》(《中国社会工作》2015年第11期),《清河实验(五):卫生工作》(《中国社会工作》2015年第12期),《清河实验(六):经验总结》(《中国社会工作》2016年第1期)。还可以参考颜芳:《燕京大学乡村建设实验研究(1919-1941)》,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蒙永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乡村建设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刘楠:《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服务与改造》,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张学东,齐凤:《近代“清河实验”及其“学院派”社会工作风格》,《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娄乔菲,李涛:《许仕廉与燕京大学社会学中国化实践》,《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齐鲁大学神学院主办的山东龙山实验区、燕京大学清河试验区等各种类型农村实验区的创建，正是得益于这些改变。^①作为基督教新的传教目标，乡村社会逐渐成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对象。有学者用“基督教大学以直接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为出发点，有目的、有计划地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来定义“社会服务”，并将其所办医疗卫生服务、农业推广及社会教育服务纳入到该主题之下展开讨论。^②不过，作者更注重宏观的整体性变化，其分析框架着重于社会服务过程、成效以及制约因素等，虽整齐划一，却失之笼统，对于社会服务的理解缺少历史感。

刘家峰的专著《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基督教乡村建设在中国如何起源、如何发展以及其意义，其中涉及了对基督教大学不同系科所办的乡村实验区的考察。从系科发展的角度，中国农学学科的最初发展是建立在引进美国农业高等院校教学科研及推广体制的基础之上的。作者梳理了金陵大学农林科和岭南大学农科（1930年后都改称农学院）的发展情况，并总结了其对中国农业高等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同时，作者也指出，虽然20世纪基督教高等教育已经开始向世俗化和职业化转变，但其“为基督教传教服务的目标从来都是明确的、无可置疑的”。这也是理解基督教大学参与当时乡村建设运动重要的出发点。此外，作者还对金陵大学农学院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燕京大学北平清河社会试验区及山东汶上试验区、金陵神学院淳化镇乡村教会实验区等大学所办实验区进行了考辨。同时，书中还对抗战期间各教会大学参与的乡建工作进行了简单梳理，介绍了在原址办学的燕京大学教育学系所办的三旗和冉村实验区，也对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迁至华西的教会大学结合当地办学条件所从

① 杨念群：《“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1，343页。

② 孙秀玲：《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事的乡村实验情况做了介绍。^①书中关注讨论的主题以及对材料的搜集整理至今仍颇有参考价值。

教会大学因其在师资及经费上的优势，尤以农学、医学等学科得益于稳定的资助而有较大发展，而这些方面的知识与技术都是当时乡村建设中最为急需的。近代乡村卫生事业的初步建设就与教会大学的乡建实践关系十分密切。有学者将大学的乡村卫生建设分为两大模式，即直接的乡村卫生建设模式和作为分支的乡村卫生建设模式。前者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直接进行综合的卫生建设，包括医疗、卫生、预防等”，参与者均是专门的医学院校或是拥有医学院的大学。后者是指“卫生建设是乡村建设的分支，即乡村建设中包含卫生建设的内容”，具体还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乡村建设实验下的卫生建设、民众教育实验下的乡村卫生建设以及乡村教育实验下的卫生建设。^②大学作为掌握先进医疗知识、技术的机构，对近代乡村卫生事业的起步与发展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因此，本书不再将教会大学列为讨论对象，而是将目光投向以往较少讨论的国立、私立等校，希望以此丰富对大学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认识。

纵观以上所述，民国时期教育实验区的相关研究，一般有三个切入角度：

第一，从思想与社会文化变迁角度切入，将民众教育视为一种教育思潮，在梳理其兴起背景、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总结各阶段特点及影响。^③教育实验区作为民众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组织形式，受到不同阶段社会思

① 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187-191页。

② 李传斌：《大学·乡村·卫生：1927—1937年间中国大学的乡村卫生建设》，《晋阳学刊》2016年第4期，第56-66页。

③ 王雷：《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想文化变迁的影响。有学者将俞庆棠、高阳、李蒸等为代表的民众教育派视为民众教育思潮的主流，认为在黄巷、北夏、惠北等地设立的教育实验区是该派民众教育实践的组成部分。^①还有学者将教育实验区放置到社会教育的范畴内进行分析，着重考察了江苏昆山徐公桥、河北定县、江苏黄巷等实验区在生计教育上做出的贡献。^②这一类研究基本上勾勒出了民众教育观念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特点，也部分涉及教育实验区的办理情况，但在相关史料挖掘方面仍有待扩展。

第二，从乡村教育、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代表人物、机构角度切入，在梳理重要代表人物生平思想及机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其办学实践的特点和历史影响。其中关注较多的人物有俞庆棠、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雷沛鸿等，关注较多的教育机构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以及山东、江苏等地重要的民众教育馆。^③此外，也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之前较少提及但同样对乡村教育、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如陈翰笙、马宗荣、陈礼江等人，这些尝试对于开拓相关研究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④但总体而言，研究仍过于集中于“热门”人物和机构（如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而对另一些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和机构（如许公鉴、邰爽秋，中国社会教育社等）的分析仍有待深入。

① 张蓉《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② 杨才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③ 张鹏：《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研究》（1929—1937），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周慧梅：《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变迁的制度分析》，《教育学报》2008年第2期；曹丽娟：《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研究》（1933—1937），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④ 汪效驷：《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基于陈翰笙无锡调查的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曾荣：《马宗荣社会教育思想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余佳珍：《陈礼江民众教育思想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